

Japane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 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2000 ~ 2016)

王宏松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13.01
20192

Japane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 2016)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2000~2016)

王志松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2000~2016 / 王志松编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201-3679-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179 号

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2000~2016)

编 著 / 王志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郭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37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679-2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日本研究”一词在中国沿用已久，但内涵究竟为何，似乎并没有一定的说法。迄今冠名“日本研究”的数种学术史著作其侧重均不同。

1997年出版的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置《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一文。该文由“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新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的日语研究与日语教育”“中国日本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五部分构成，概述了先秦至1996年的日本研究史，其中设专章突出“日语研究与教育”，对其他领域大多一笔带过，对经济与外交领域则完全无视。2009年出版的中华日本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合编《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1997~2007）》（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紧接前著概述了1997~2007年的日本研究史。该书较为详细地评述了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社会 and 文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但漏掉了日语语言和日语教育方面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的日本研究，内容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宗教、历史领域，却缺少文学和语言的内容。

概括起来，上述学术史著作对“日本研究”的理解有两种：一是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为代表，突出“日语研究与日语教育”；二是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为代表，注重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忽略语言与教育。这样的反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日语教育体制和日本研究体制的状况。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教育部与日本文部省共同创办的一个集教育与研究为一体的机构，脱胎于早期培养日语教师的“大平班”，因此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师资配备和工作重心上自然关注日语语言研究和日语教育。这也是当时中国大多数大学日语专业教师所关注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而南开大学日本

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文化，不包含语言教学。当然，大学日语专业和日本研究机构在研究方向上分工不同、各有所专并非坏事，但编撰冠名“日本研究”的学术史著作或突出或抹掉“语言教学”并不妥当。表面上看这是囿于学科体制乃至机构藩篱的结果，细究起来有其历史渊源。

中国有关日本的记载可以上溯至《魏志》，但较为系统的研究还是始于近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5年刊行）。该书凡五十余万字，第一次全面记录了日本的国情。黄遵宪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变，认识到中国若要富国强兵，远法欧美不如近学日本。同时，国力增强后的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也引起他的高度警惕。这样的对日认识影响了《日本国志》的篇章结构，即“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①该书虽然通纪日本历史，但将明治维新史作为记叙的重点，意在借镜而观。

《日本国志》的编撰策略简言之是通过对明治维新史和文物制度的详细叙述，一是吸收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二是探究抵御日本侵略的方略。即黄遵宪的“日本研究”是迫于拯救中国的现实，将日本作为观照中国的镜子和了解西洋的窗户。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改造中国自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过分囿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对日本的客观把握上存在欠缺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研究”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在三四十年代侧重后者，在七八十年代侧重前者，并催生了一批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

戴季陶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曾抱有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② 这是他的《日本论》（1928）开篇中的一段话，但从成书来看，其三分之二的内容关注的仍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问题，对日本的整体文化仅是蜻蜓点水。他自谦“力不从心”，实则为紧迫的社会现实所不容许。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7页。

② 戴季陶、蒋百里：《日本论 日本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1页。

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外语教学政策从一开始就提倡“工具论”。大学日语专业本科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均注重“读写听说译”的语言技能学习，而文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课程也是为掌握语言技能服务的。^①因此，文学和社会文化课程的专业性往往被忽略。可以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由此形成的这种日语教育体制和日本研究机构的格局，长期制约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因此，前述学术史著作对“日本研究”呈现正好相反的两种偏差理解绝非偶然。

然而也要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教育 and 研究体制以及研究层面上已经悄然出现一些变化。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研究对象“日本”发生了变化。首先，近代以来中国研究日本是将其当作现代化成功的榜样学习，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进入持续的经济低迷期，榜样的光环消退了。其次，中日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问题争执不断，2000年以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往依然密切，至2017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最后，民间交流显著扩大。这主要体现在日本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赴日旅游的持续升温。不经意间曾经的“经济大国日本”变身为“文化输出大国日本”。

(2) 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由二元对立的结构朝着多极化的、变动不居的格局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各自都不断调整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新角色，也在探索适应对方的新角色，因此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先行的思维模式或一对一的两国关系把握方式难以应付急剧变化的中日关系及其所牵带的地区平衡乃至世界格局。

(3) 教育体制、研究体制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学的专业日语教育主要是本科，侧重语言技能教学，从90年代开始随着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的广泛开设，文学、社会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得到显著加强。加之，相关的日本研究机构也招收社会文化方向的研究生。随着这些研究生的毕业和留

^① 戴炜栋、胡文仲主编《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第233～269页。

学人员的归国，大学日语专业研究方向的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不仅有语言教学的教师，也有文学、社会文化方向的教师。当然，受编制所限，每所大学所拥有的专业方向并不齐全，但本科阶段社会文化方向的教学逐步受到重视。

这些变化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问题意识上影响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并在21世纪逐步显露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具体情况，请参看本书各位专家的评述。从编者的角度看，感受最深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正逐步淡化以往的功利主义色彩，即不再仅仅把日本作为镜子和窗户，而是也作为“他者”看待。因为无论作为镜子还是作为窗户，日本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他者”看待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承认日本的“异文化性”和“主体性”。这样的态度转变有利于更为客观地把握日本，不会因为与之不同而拒绝，也不会因为不再是“榜样”便弃之不理，采取超然于一时之现实性的态度，将眼光放得更宽，综合更多的学科探究问题；把眼光拉得更长，历史辩证地思考问题。语言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的阻隔自然消弭于其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中日近代借用词方面的研究。^①但这种“客观化”，并不意味着将日本当作与中国无关的对象。这就是其二，将日本作为中国的“他者”，恰好是认为中日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性。无论在东亚的现代化转型中，还是在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中日双方都深刻地相互既促进又制约对方。这种深刻的关联性，既是日本研究的重要动机，也会影响研究者的立场及其对日本的形塑。研究者们意识到这种立场的现实意义，也自觉其局限性。编者个人以为，新的研究正努力在这两个维度——超然性和现实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本书将学术史范围重点放在21世纪之后，内容涵盖语言、教育、文艺、社会和文化，就是希望及时总结这些新的动向，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略尽微薄之力。

本书的编撰有些偶然性。以编者本人的学识本来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最初只是想编一本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材。本人长期从事本科生毕业论

① 比如李运博著《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等等。

文课教学工作，近年来发现选做社会文化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多，但受教师研究方向的限制，许多选题无法得到指导。因此打算编写一本教材，上编介绍论文写作格式，下编介绍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考这些学术史，把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学习研究方法。为了不误人子弟，在计划之初就决定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来执笔下编。从2016年开始约请专家，得到大家的积极支持。参加者既有大学教师，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不想当初的这一念头，竟无意之中促成了语言、文学、社会和文化学术史写作的一个合作。

因是教材，每个领域的学术史篇幅不宜过长，最初请大家写五千至八千字。然而在执笔过程中，不断有专家反映五千字的篇幅太少，八千字也打不住。于是决定与教材切割，不再限制篇幅，索性放开写，并于2017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当代日本学学术史（2000～2016）高端论坛”。会上专家们各抒己见，相互质疑，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本书便是在这次专题会议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编辑而成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在各位专家的热情推动下完成的。或许这本身也是日本研究新倾向的现象之一。如果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功劳全在各位专家。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端论坛”虽然获得学校的经费支持，但绝不是那种可以填入年终业绩表格的项目。也就是说，专家们是在没有任何项目名头的情况下慨然参加撰写工作的，并倾注了巨大精力，令人动容。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超越了“功利主义”。在此，向各位专家致以崇高的敬礼和诚挚的谢意！

编者：王志松

2018年2月22日

目 录

前 言	001
-----------	-----

语言学与教育研究

日语语言学研究	潘 钧 / 001
日语教育研究	朱桂荣 / 059
汉日翻译研究	王宇新 / 095

文学艺术研究

日本古代文学研究	蒋义乔 / 141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王志松 / 201
日本美术研究	程 茜 / 244
日本大众文化研究	王志松 / 266

社会研究

日本社会研究	胡 澎 / 281
日本经济研究	丁红卫 王文文 / 303

日本政治研究	吴怀中	孟明铭 / 327
日本外交研究	李 丰	/ 360

文化研究

日本历史研究	邵建国	冯晓庆 / 388
日本思想史研究	唐永亮	/ 417
日本民俗（学）研究	王 京	/ 442
日本宗教研究	史 歌	/ 484

语言学与教育研究

日语语言学研究

北京大学 潘 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日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成绩斐然。一方面是国内的日语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来自教学一线的各种问题和需求对日语研究提出了诸多现实课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包括中日两国在内，世界语言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对国内日语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加之，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不论是负笈东瀛的学子还是主要在国内学习、研究的师生们，皆能凭借互联网等媒体手段得到最新的动态信息，达成交流互动。在某些前沿研究领域，两国研究者已基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差距日益减小。此外，国内硕博研究生的培养及教师申请课题制度的完善，客观上也对大量新成果的产生起到了促进和催生作用。

下面拟分语法研究、词汇研究、汉日对比研究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近 20 年间的日语语言研究成果予以概述与回顾。

语法研究篇

本文所论语法研究,不包括汉日语法对比研究。早期日语语法研究的基本动力之一,与词汇研究有相似之处,就是来自教学实践现场,因为汉日语法存在很大差异,教学一线会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点,即来自日本及欧美的语言学理论多波次不间断地输入中国,并通过两国人员交流及书本、互联网等媒介手段的传播,给国内的日语语法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并且,这些波次也是世界语言学潮流的反映。因此,语法研究较之词汇研究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

(一) 研究历程概述

1.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两国间包括文化在内的各方面交流日益密切。20 世纪 70 年代末恰逢日本现代日语语法研究迎来黄金期,出版了很多语法学著作,源自美国的生成语法等传入日本,日本的对外日语教学进入高潮,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日本語学』(明治书院)杂志的应运而生。与之前的国语研究不同,当时出现的重要变化是,日语被置于相对化的地位,即被当作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一员,集共性与个性于一身,这由令人耳目一新的刊物名也能看出来。^① 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语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日语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渐次展开,国内对日语语法的研究也进入起步阶段。最初的研究还主要围绕具有日语特点的助词、助动词的功能用法、词类划分、语态、授受、敬语等基础问题展开,具有明显的解决教学一线问题的实用特点。早期研究以介绍类文章居多,叙述视角也较为宏观,这从论文题目中亦可窥知一二,如题目冠以“试论”“略谈”的论文较多。此阶段研究多偏向实用性,因研究者们汉日对比意识较强,出现了不少包括偏误分析及汉日对比研究雏形在内的研究成果。故此,介绍和偏误研究成

① 之前的国语学则是将日语绝对化,否定其与世界语言的可比性。

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语法研究的主流。

具体看,时体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初,成果比较丰硕,基本沿袭了先笼统介绍后逐渐深入研究的一般路径,特别多见从汉日对比的角度研究时体的论文,并取得了较大成果。此外,语态研究,包括使役、被动、可能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虽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兴盛于 90 年代,尤其是留日学者杨凯荣的汉日使役对比研究、张威的结果可能研究以及张麟声的被动研究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在日本的研究一方面迎合了当时日本对外日语教学迫切希望解决偏误问题的需求,也昭示出对比研究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殊魅力。这批留日学生部分学有所成,于 90 年代初陆续回国,加上其后中日之间人员往来愈加频繁、学术交流空前热烈等因素,直接、及时地传达了日本学界的最新动向,给国内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机遇。语气研究也是滥觞于 80 年代,但 90 年代以后取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成果。与时体、语态研究不同,语气方面既有对比研究,也有比较可观的本体研究成果。

总的来看,国内语法研究与日本国内研究的脉络是基本一致的。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领域研究交替流行的时代,70 年代是格、语态研究,80 年代是时体研究,90 年代则是语气研究等,即从语言内部结构研究,逐渐转向人的主观层面的研究。国内基本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较日本稍晚一些。但也有与上述流行领域不完全同步的研究,如始自 90 年代的词组学研究、复合辞研究以及这十多年来的复合动词研究、偏误研究等。

国内日语语法研究成果的刊登园地,20 世纪 90 年代前主要是《日语学习》(1979 年创刊,1990 年停刊,商务印书馆)、《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 年创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等。日本及国内知名学者的讲座、集中授课、学会报告等也是当时获得最新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日语研究尚处草创期的那个年代,杂志连载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探讨的途径,带有启蒙与普及的性质,同时也是当时出国不易、图书资料较为缺乏的缘故。《日语学习与研究》和《日语学习》上均刊有不少连载的语法研究文章,其中既有著名日本学者如北原保雄、森田良行、佐治圭三等大家所撰的文章,也有国内学者的连载论文,如陈信德《现代日语的句法(一~四)》(1980)、

王宏《日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一、二)》(1980)、宋文军《现代日语基础语法讲话(一~十二)》^①(1982~1983)、刘耀武《日语语法结构研究(一~六)》(1989~1990)等。

2. 进入 21 世纪至今

进入 21 世纪后,日语语法研究不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增强。前述时体、语态、语气等领域的研究在继续,但势头明显放缓。词组学研究、复合辞研究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特别是前 10 年,词组学研究主要依靠北京大学的彭广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吴大纲等人的推动,他们及不少学生从事此方面研究。复合辞研究主要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戴宝玉一人坚持多年,发表了不少原创性成果。此外,复合动词研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大亮点,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威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标志性事件,集合了国内外诸多一流学者集体攻关,取得了很多成果。另外,偏误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现一个高峰,当时以病句或误用的名义进行研究,但理论性不强。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偏误研究进入新阶段。王忻、张佩霞、毛文伟以及旅日学者张麟声、于康的研究颇引人注目。

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自主培养博士成为一个迥异于 20 世纪的特征,前期多以语法研究为主,多数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以专著形式出版。此外,各种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内外名家讲座等面对面的交流,以及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等,对日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也起到了助推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自 2007 年起改成双月刊,目的是适应国内日语专业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建立以及教师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此外,商务印书馆的《日语研究》(2003 年出第 1 辑)问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等其他各类语言学期刊及各类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也有不少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从研究本身的趋势看,第一,如徐一平(2009)所述,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向主观层面渗透,“特别是对认知、语用、功能语法的运用可以说研究者将视点紧紧锁定在了语言的运用主体——说话人及听话人的身上,体现出了对

^① 198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同名单行本。

人的主体性的重视”。^①如马燕菁的《言语交际中接续助词“し”的主观性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傅冰的《日语使动句式和他动词句式的语用特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文江的《「PながらQ」的语义类型分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张兴的《信息标记理论及应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2期）等。第二，与狭义语法学之外的其他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结合、融入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原有的描写语法难有突破，学界开始探索认知语言学等新理论、新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范围，在方法论上也获得了新的工具。第三，不像上个时期受日本研究多波次影响，连续出现一个个高潮，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较为分散，但却向着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有的研究已从追跑向并跑甚至领跑日本学者的方向发展。不过，即便热点分散，复合动词研究仍是国内语法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热点，期待该研究成果对日语教学也会有较大贡献。第四，大胆质疑名家学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胡俊、黄炎芳的《日语主位及其推进模式》（《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原理对日语主位及其推进模式进行了探讨，并且大胆地对胡壮麟学说提出质疑。白晓光的《“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定义与功能——兼与增田（2001）商榷》（《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6期）一文对发表在日本权威杂志上的日本学者增田真理子的论文观点提出质疑。第五，历时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即便难以全面追踪语言的历时变化，但部分地或有限地关注语言史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赵宏的有关日语程度副词的系列历时研究值得关注，如《历时语言学视野中的日语程度副词研究——在中古时代的使用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3期）等。第六，将汉语研究的成果或方法用于日语语法研究，如黄毅燕的《日语「NP+の」的转指问题》（《日语研究（5）》，2007）。费建华将语义指向用于研究日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反映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专著《现代日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研究》（2013）中。这也是中国日语语法研究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第七，出现理论探索的成果，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宗华的《意向性理论与语言过程说》（商务印书馆，2007）就

① 引自徐一平《2008年日语语言学研究动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期。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语言理论研究著作。第八,自觉广泛运用语料库成为这个时期语法研究的一大特色,如朱鹏霄《对「~かどうか」句式的考察——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等。

(二) 若干主要领域的研究

1. 语法著作

1980年,《日语学习与研究》分4期连载了北京大学陈信德的《现代日语的句法》。陈信德是国内最早有语法著作的学者,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著名的《现代日本语实用语法》,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对草创时期我国的日语教学和日语研究产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其他较有影响的语法书还有王曰和《日语语法》(1979)、周炎辉《现代日语语法》(1982)、朱万清《新日本语语法》(1983)、皮细庚《新编日语语法教程》(1987)、徐昌华《简明日语句法》(1988)、刘耀武《刘耀武日语语法论文集》(1992)、曹大峰《现代日语高级语法教程》(1999)以及王诗荣《现代日语句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等。

2. 语法专著

进入21世纪后,语法研究专著大量涌现,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内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及职称评审的著作导向,不少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完善后很快付诸出版,如吴大刚《现代日语动词意义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朱立霞《现代日语省略现象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徐卫《现代日语顺接条件表达的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许宗华《意向性理论与语言过程说——时枝语法解析》(商务印书馆,2007)、杨玲《日本語授受動詞の構文と意味:日语授受动词句结构意义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毛文伟《现代日语助词性机能辞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苏鹰《日语的逆接接续表现》(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孙佳音《现代日语时间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赵蓉《日语的「にーが」句式》(学苑出版社,2011)、王华伟《现代日语否定表达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马小兵《日语复合格助词与语法研究》(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彭玉全《关于与现代日语时间表达相关副词的研

究——以表示事态存在副词和事件发生副词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刘健《现代日语二字汉语动词体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周彤《现代日语形容词词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戴宝玉《基于语料库的日语研究》（学林出版社，2012）、刘艳文《现代日语时间复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费建华《现代日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陈连冬《日语强调助词之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毕晓燕《关于现代日语形容词与名词组合的描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陆洁《日语连体修饰节中体表达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吕雷宁《现代日语无意志自动词可能表达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史曼《基于事件结构理论的日语复合动词自他交替现象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邱根成《日语サ变复合动词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王冲《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张玉玲《现代日语V_テ副词研究：从V_テ向副词转类的观点出发》（学苑出版社，2016）、陈燕青《日语复句句式变化研究：从格成分看连体到连用的连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黄小丽《日语名词的跨从句语法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谢冬《基于教学语法观的日语复合格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赵凌梅《日语中歧视语的概念及其变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洪洁《语法化视阈下日语“名词+だ”结构分化机制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毛莉《日语助词“の”与汉语助词“的”的对照研究——从日语教育的视角出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等。^①

3. 各领域研究

除了介绍性文章外，从方法视角看，国内日语界的语法研究不外乎本体、对比、教学研究三类。时体、语态、语气研究主要是前两类，有的领域则对比研究更多一些，如语态研究。复合辞研究主要是本体研究，也有对比研究。而复合动词研究三类俱全，实践性较强。类型学研究则以前两者为主。

^① 受时间、篇幅以及信息搜集手段等因素所限，此处罗列的专著只是一部分，属不完全统计。